

《辽阳壁画墓群》学习笔记

郭大顺

一

辽阳壁画墓群是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第167号)。此后陆续又有新的发现。随着60年代以后在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又不断有汉晋壁画墓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辽阳壁画墓的重要性更突显出来,但因一直未能发表正式考古报告,材料分散,尤其是壁画的发表资料很不完整,使有关研究无明显进展,学术界对辽阳壁画墓的研究力度也自然有所减退,这就直接影响到公元2世纪到5世纪前后当地古文化发展及其与东北其它古文化关系等重大学术课题研究的深入,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延缓了有关课题研究的进度。看来,尽快系统的整理和发表辽阳壁画墓发掘报告并加强研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我于2004年2月14日到辽阳参加壁画墓保护论证,前后查了一些材料,作成笔记,并就辽阳壁画墓的学术价值,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对这批重要考古资料的整理和系统发表,起到一点促进作用。

二

目前全国已发现的汉魏壁画墓共约100处,时代从西汉起,东汉中期为发展的盛期。其中辽阳壁画墓20座,占到约1/5。辽阳壁画墓及有关石室墓又大都分布于现辽阳城的北郊(北园、棒台子、三道壕、上王家、迎水寺、南林子和玉皇庙)和东南郊(鹅房、唐户屯和桑园子、鞍山东沙河、南雪梅,市区东门里也可归入这一片),所以,到目前为止,辽阳仍然是汉魏壁画墓分布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这就为从一个地区了解汉魏壁画墓从墓葬结构到壁画内容的前后演变过程,进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这也是同一时期其它地区壁画墓以单个出现为主的情况所不具备的。

辽阳壁画墓和有关墓葬,从多角度反映了汉、魏、晋时期辽东地区在当地和中原移民的共同经营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时期当地社会文化发展及与周边关系,从而可以对公孙氏经营辽东在汉末魏晋时期的历史作

用和地位有进一步理解。我在收集、学习这批资料时，对以下三个方面，印象深刻。

一是规格高。

从西汉到两汉之际始，表示人与人间的等级身份，渐由此前的土坑木棺椁制逐渐演变为模仿生前所居和日常生活的砖室结构及绘壁画等。又据俞伟超先生研究，多代合葬墓起于西汉末而盛于东汉，是大土地所有制下强化家族制，代替周代宗法制度的反映。与此相应，随葬品以模型明器代替礼器，也是庄园经济发达的表现。壁画的内容、布局与变化规律，反映现实生活的车马出行、仕宦经历、墓主人宴饮、乐舞百戏、庄园府邸、侍从属吏、庖厨劳作、农业生产等，也主要是庄园经济发展的反映^[1]。

辽阳地区的石室壁画墓，具有多人合葬、随葬模型明器、壁画反映墓主人现实生活等内容，虽有地域特点，仍遵循汉制，这也包括其中所表现的等级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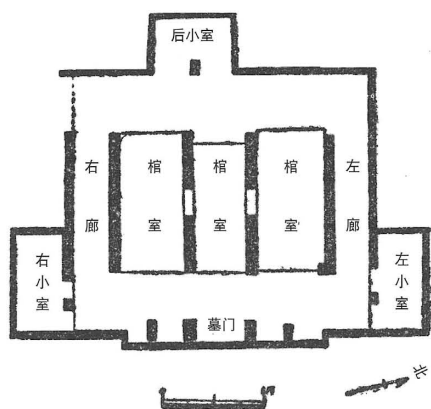
一般以为，有车马出行图的北园1号墓、棒台子1、2号墓、三道壕车骑墓规格较高。其中棒台子1号墓，封土作截头方锥形，存高7米，底边每面长22米。椁室中央纵列4组石板分作3个棺室，外围回廊，左右后各突出一小室。计左右宽8米，前后深6.6米，高约1.4米。墓门有石柱4根，石扉3扇。壁画：左右两小室为主人饮食图，其中右小室6人，主人屏后侍立2人，前跪进食3人。左小室9人，主人前进食5人，后侍立3人。主人面对的墓门内左右两壁为杂技图。右壁3层共23人，左壁也3层约25人。出行图在右廊左右后3壁及左廊左壁，除右廊后壁为一层外，都为两层。共173人，127匹马，10辆车，其中有黄钺车、鼓车和金钺车等王室出行车。后廊后左壁为宅第图，中央有3层的高楼阁。庖厨图在后小室的右、后、左3壁，共22人，从事屠宰、烹饪、清理等。此外，墓门为门卒图，有2门卒和2门犬。盖石、壁端和棺头绘云气图。是为辽阳壁画墓中规模最大、壁画内容最为丰富多样的一座，时代定为东汉末年^[2]（图一）。

北园1号墓封土存高约10米。石室长7.85米、宽6.85米、高1.70米。前、侧、后各有小室。中央由4条石壁隔为3室，四周形成回廊。以梁、柱、拱、扉等架起如屋，设排水。壁画：后小室之后、左壁为宴饮图，主人西隅面东，东二人鱼贯对坐，四小吏恭侍。后右壁由右一左分别为属吏图、楼阁图、乐舞图(上)、杂技图(下)，右小室斗鸡图，前左角仓廩图，室中右壁车列图，

室中中左壁骑从图。墓葬规模、结构及壁画内容所表现的规格仅次于棒台子1号墓^[3]（图二）。

结合这两座墓的年代在汉魏之际，多推测墓主人即为公孙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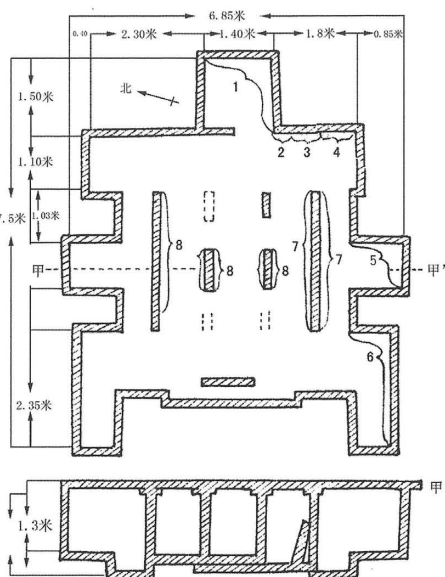
对以这两座大型壁画墓为主的辽阳壁画墓群的等级规格，需要多加论述的是，这两座壁画大墓，在墓葬结构上，都有设回廊的作法。墓葬设回廊，是从西汉开始诸侯王一级的墓葬使用的作法。北园1号墓与棒台子1号墓，虽然在辽阳壁画墓中，是规模最大的两座，但与中原等地的汉代墓葬相比较，不仅小于有回廊的诸侯王墓，



图一 棒台子一号墓平面图

也较许多汉代的三室壁画墓要小。如河北、内蒙古等地东汉晚期的三室或三室壁画墓，全长都在20米以上，望都2号墓达32米，安平有大型车马出行和建筑鸟瞰图的东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多室砖室壁画墓，长度超过40米。但宿白先生70年代初就认为，辽阳壁画墓中这种中部建棺室，四周绕以回廊的大墓，规格要高于东汉有前、中、后三室的大型壁画墓，而可与设黄肠石和回廊的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前期中山简王刘焉(光武帝刘秀少子，60年代末70年代前发掘的唯一一座汉诸侯王墓)墓相比较，即其等级相当于汉诸侯王^[4]。这方面还值得提到的是，随着东汉后期地方官吏、豪强势力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衰落，诸侯王墓取消回廊，从诸侯王到二千石甚至一千石的官吏，均用多室或三室墓，包括河北省望都第一、二号壁画墓^[5]。这样，时代在东汉末年或以后的辽阳壁画大墓，仍使用设回廊的作法，就是汉代这种诸侯王墓葬结构的最后实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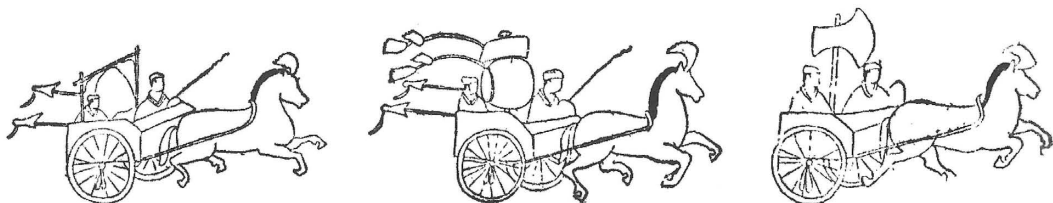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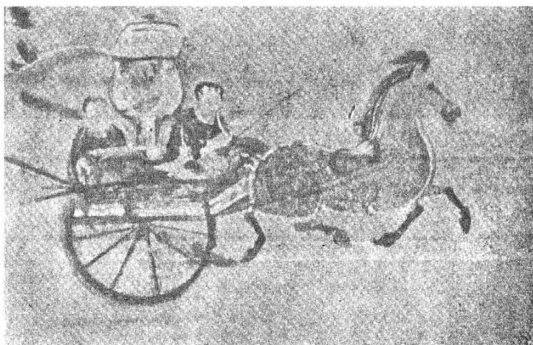
辽阳壁画墓等级较高还表现在墓葬壁画上。尽管辽阳壁画墓壁画的尺寸与其墓葬规模一样，也都要小于中原等地区的大型壁画墓，但在壁画题材的使用上，却规格较高。如北园1号墓屋顶饰金凤，上王家墓也有龙衔流苏，与诸侯王一级相当，在技法上也不相上下。尤其是棒台子1号墓的壁画车马出行图中，有黄钺车、鼓车和金钺车，对此李文信先生根据《后汉书·舆服志》“乘舆大驾”“甘泉卤簿”的组合中有“后有金钺、黄钺、黄门鼓车”的规定，认为这是使用了帝王出行的规格：“墓画的车骑仪仗图中有金钺车、黄钺车、黄门鼓车各一辆，这是汉代封建统治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吏将军们出行时，仪仗队中才能有的车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也认为：



图二

北园一号墓平、剖面及壁画分布图

1. 宴饮图, 2. 属吏图, 3. 楼阁图,
4. 乐舞杂技图, 5. 斗鸡图, 6. 仓廩图,
7. 车列图, 8. 骑从图



图三 棒台子一号墓金钺车、黄门鼓车、黄钺车临摹图

“棒台子屯壁画墓回廊的壁画上，绘有墓主人乘车出行的盛大行列。行列里，除了执着各种彩幢、华盖、启长旗的骑从外，还有帝王出行的黄钺车、鼓车、金钺车等仪仗。这充分表现了豪族割据一方的情况。”^[6]（图三）

由于汉代帝王陵墓尚无被发掘的先例，而华北等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壁画墓，尚未见有这种有帝王级内容的壁画题材，所以棒台子1号墓是迄今为止唯一从壁画上反映具汉代帝王出行的内容，尤为珍贵。

辽阳壁画墓在墓葬结构和壁画内容上表现出的高规格，与史书关于公孙氏雄踞辽东图霸的记载相一致。

据《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东汉末公孙度被董卓幕僚荐为辽东太守，即有“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的雄图大略：

“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领辽东、辽西、中辽郡。随着势力的扩张，多有僭越之举：“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埤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汉兵，乘鸾路九旒，旌头羽骑。”

《晋书·地理志》又记：“后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据辽东，东夷九种，皆服事焉。魏置东夷校尉，居襄平，而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可知到三国时期，公孙康仍授平州，更置带方郡，领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兼东夷校尉。是为统领六郡，其地位不仅高于太守，也高于州刺史。到康子公孙渊时，更立为燕王。

以上考古结合文献的比较进一步证明，这些相当于中原地区诸侯王一级的高规格墓葬，确与公孙氏有关，也说明公孙氏割据辽东僭越程度之深。

二是地域特点的连续演变过程强。

辽阳一带包括壁画墓在内的汉魏墓葬，能辨别出时代的，从西汉末期起，经东汉、魏、西晋到东晋初，前后共约300余年，时间基本可以衔接起来。其间的早晚演变从墓葬形制的变化看，大致可分为：早期以土圹木棺槨墓为主，中期以夫妻合葬的砖室墓为主，晚期以家族合葬的石筑（室）墓为主^[7]。其中从土圹木棺槨墓到砖室墓，形制及演变与中原有相一致的地方，又有所交错。而石室墓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墓葬中，出土甚多，最能反映地域特点，而且壁画墓全部都为石室结构，所以墓葬类型、主要是石室墓，是研究辽阳壁画墓地地域特点及其演变过程最主要的一项内容。

关于辽阳壁画墓的断代及结构演变，已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壁画墓与其它石室墓结合起来进行分期断代，从而追溯辽阳石室墓及壁画墓的起源，也有所论及。这里再作些整理补充。

首先是关于这些石室墓年代的上限，50年代初发掘唐户屯和鹅房墓地时，发掘者当时就提出这两个地点有时代较早的材料。其《简报》中的有关论述对判断石室墓的早期或更早期情况较为重要，特较多予以引用：

唐户屯在辽阳市东20里太子河北岸，1954年5-6月清理192座，多石室墓：“在筑墓材料上有97-98%用石板，砖墓、木棺墓极少。”这些石室墓的构造“主要是用石板支筑墓壁，前留墓门，上盖和地面都平铺石板，用石灰勾缝，单室墓平面多为长方形，复杂的有丁字形、工字形、十字形几种。一般椁室规模不大，平均长约2至3公尺，宽约15至2公尺左右，3、4公尺以上的占极少数。方向多为南北向，或稍偏东西的南北向，椁内多有板石尸床，放置尸体。尸床的内部为高起的明器台，上放各种陶制明器。墓门前方有斜达地面的斜坡墓道，椁室上方今多垦为田地，已不能判明确无封土。椁内埋葬的人骨以男女两体的为最多，单人葬较少，多至十余个人的为特例。一般都把尸体放置尸床上，仅有极少的几墓有木棺。”

随葬器物“以陶明器为主，多数是生活用具的模型，最常见的有：锅、灶、钁、甑、水井、汲器、瓶、罐、案、俎、杯、盘、奩、盒之类，…银、铜指环、琉璃耳饰、玛瑙珠、手镯、骨珠等。金属器物有：铁镞、环头铁刀、铜带钩、铜顶针、小铜印两方，一方为白文篆书‘韩□私印’（第146号墓），一方为朱文‘公孙□□’之印（第37号墓）。此外，几乎每墓都有钱币，其中以汉五铢为最多，王莽‘货泉’、‘大泉五十’、‘货布’较少，‘小泉直一’仅见一枚。”

据此，简报分析：

“综合这些墓葬出土的文物，它们的可靠年代大约是由西汉末到东汉。”

“后来这种筑墓方法逐渐发展，终于普遍通行于辽阳附近，这是研究辽阳石椁墓的重要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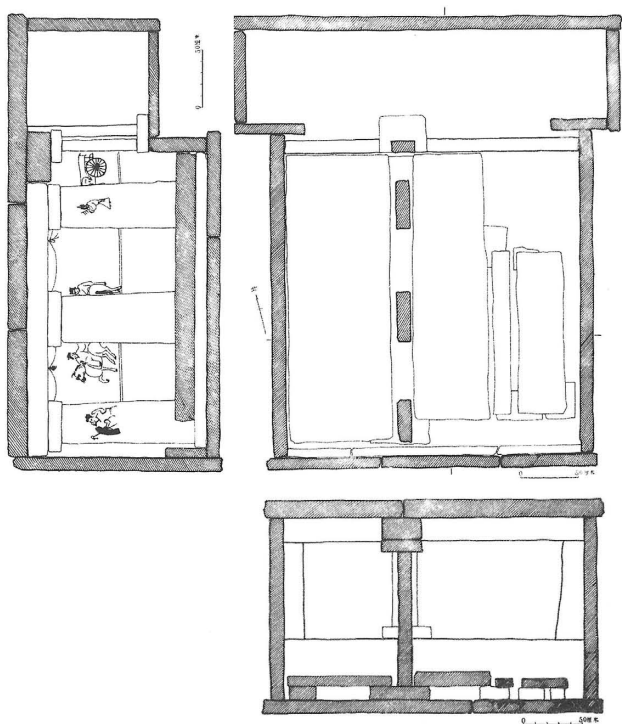
位在辽阳市东南郊的鹅房可能有更早的线索。该地清理19座汉墓。有时代较早的土墓、木椁墓，也有时代较晚的石墓和砖墓。发掘者并透露，已有西汉初和更早期墓的发现：“在西汉土墓和东汉石墓下一公尺余的地层中，发现了更早的墓葬，它的葬法、墓室结构、明器种类和形式都与一般出有‘五铢’、‘货泉’等钱币的墓葬的出土品迥然有别，这一发现在鉴定辽鞍地区汉及先汉墓葬的年代上，有了土层的科学根据。”这段话虽然主要是表达土墓、木椁墓、砖墓和石墓的时代先后关系有地层上的证据，说明辽阳地区汉魏墓葬与“先汉”时代墓葬既区别又有所联系的情况，其中是否也透露出“石墓”可能有更早一点的信息呢？^[8]

专就壁画墓而言，时代较早的是东门里的一座。该墓位于辽阳市东，明代旧城东南城墙下。石室门在南，后有横置的明器室，无前廊、耳室等，平面呈“丁”字形，结构较为简单。随葬陶器有房、井、灶、鼎、锤、奩、案、灯、博山炉等，种类、形制都为东汉墓中常见的型式。壁画只有出行图和宴居图，缺少墓主人夫妻对坐、建筑官邸、乐舞百戏、庖厨等，却有羊、飞廉等神兽。发掘者从墓室结构简单、器物无东汉晚期、壁画有飞廉无夫妻对坐、百戏、庖厨等分析，将时代定为东汉中期略晚^[9]（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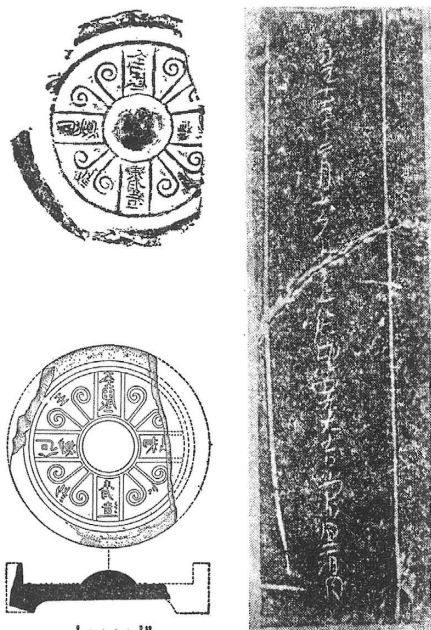
辽阳汉魏石室墓的延续及下限，出文字和文字纪年的墓是重要参照。辽阳汉魏晋墓葬有文字和文字纪年的有：

三道壕第27号墓随葬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5年）款陶案，为东汉中期纪年^[10]。

北园一号墓题字中有室中右小壁“季春之月□（汉）”，发掘主持人李文信先生描述此为



图四 东门里壁画墓平、剖面图



图五

左；三道壕第7号墓出土“太康二年八月造”瓦当拓本及图 右；三道壕第27号墓出土“永元十七年”陶案拓片图

“汉”字：“月下一字，左存水旁，右上草头，口字尚明显，盖汉字也。意表三月，无可诤解，若汉字不错，时代明白，尤为可贵。”所以一般将这座墓的时代推定为东汉末期^[11]。

三道壕令支令墓。平面结构有前廊、左右耳室。二棺室及一左廊。右小室右壁及后壁绘男女对坐。男主人后有“口(巍)令支令张口口”，时代为曹魏时期^[12]。

三道壕7号墓石室木棺，随葬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瓦当，共出有“宜子长生”铜镜。时间为西晋^[13]。

三道壕西晋墓，工字形，前后廊各有左右耳室。四棺室。共葬三男三女。石壁有晋太康7-10年刻款(公元286-289年)。还有“襄平”刻款。并出“位至三公”镜^[14](图五)。

上王家石室墓被视为已知辽阳壁画墓中形制最晚的一例。这座墓东西进深5米，南北宽4米，墓顶最高2.5米。由前廊、两个棺室和左右两小室组成，已无后室。门向东开。尤其是前廊的顶部非一层，而是由四行石板，抹角迭压，从而形成方形的平顶天井。男性墓右臂旁还出一青瓷虎子。壁画也有新题材：右小室正壁绘墓主人坐方榻，戴冠蓄须，右手持麈尾。左小室的车骑出行图，增加了黄牛黑轮车一辆。推定这座墓的时代在两晋之际，或已到东晋时期^[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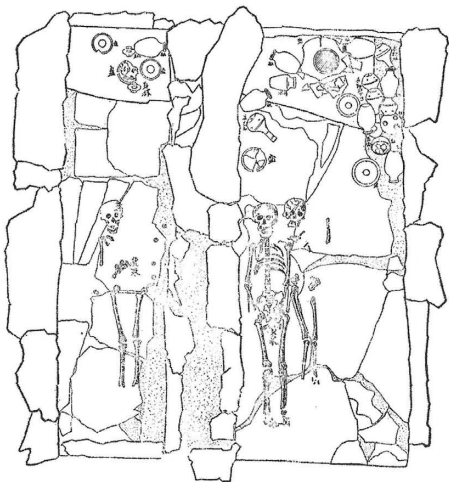
根据以上资料进行的辽阳壁画墓分期，大同小异^[16]。遵宿白先生观点，他将辽阳壁画墓统一分为三期：汉魏之际、魏西晋和东晋。并概括墓葬结构早晚演变规律为由繁而简，由盛而衰。

东门里墓发现后，又有提出由简到繁再简的演变规律^[17]。

以上说明，石室墓在辽阳一带开始较早，可到西汉末，延续时间较长，经历东汉、魏、西晋直到东晋，时间约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初。由于石室墓在辽阳汉魏已经流行的墓葬类型中，既不同于土坑木棺木椁墓，也不同于砖室墓，却是汉魏以前当地墓葬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其间，虽由于公孙政权的灭亡而有规模变小，结构变简的趋势，但仍由西汉一直延续到两晋时期，这就自然提出了辽阳汉魏时期的石室墓、包括辽阳壁画墓的石室结构的来源问题。一种可能是汉魏时期各地共同或相近的时代特点，如两汉时期流行各地的画像石墓与辽阳壁画墓都用加工整齐的石板砌筑，也有相近的画像题材，其中山东发达的汉画像石墓与辽阳壁画墓可能具有文化联系。但是否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与辽东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里着重论述后一种可能性。

首先，石室墓在当地渊源甚早。辽东地区在青铜时代就以石室墓发达而著称，构成了距今三千年前后这一地区强烈的地域特色。其结构虽可分为土坑石室墓、大石盖墓、石棚式石室墓等多种形式，但仍以石板筑墓为基本形制。战国以后，随着燕文化向东北地区的深入，特别是燕秦汉郡县制在东北南部地区的推行，具中原地区特点的土坑墓兴起，继而汉代有砖室墓流行，但石室墓并未被完全替代或消失，而仍在顽强延续。近年在辽东地区已发现石盖石棚式石室墓葬可晚到西汉时期的实例，说明反映当地民族葬俗特点的石室墓，与辽阳地区汉魏时期包括壁画墓在内的石室墓，在时代上已进一步拉近或已衔接。

其次，是对辽阳汉魏石室墓中早期形制的分析。刘未将玉皇庙3号墓作为辽阳壁画墓中时代最早的墓，特征是长方形石室，随葬圆形陶灶。时代在东汉早中期间，并据此以为，这种长方形石棺与当地传统有关。不过，唐户屯石室墓的结构可能更说明问题。如已发表的唐户屯62号墓，其石室结构，无论顶盖、底板和堵板，都是由不规则的多块石板拼合而成，侧板更用了较大的石块，这与汉代画像石墓以加工完好整齐的石板拼砌的作法有很大不同，而更接近于辽



图六 唐户屯第62号墓

东地区当地青铜时代流行的石棺墓的作法^[18] (图六)。

第三,如前述,汉魏时期的石室墓在辽东地区延续时间长,由西汉、东汉、魏西晋直到东晋,而各地的画像石墓到东汉末已开始衰落,逐步转向石刻佛像,但石室墓在辽东仍兴。特别要提到的是,魏晋以来中原地区出现的新墓制很快向周边传播,辽东地区是唯一未受影响的地区,这显然与当地固有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19]。

所以,以为辽阳壁画墓有来自当地的传统,是可信的。

东汉末年以后的公孙氏时期,石室墓的更加发达和延续,如与当地青铜时代石室墓的传统习俗有关,这或可视为公孙氏在辽东统治过程中,重视当地文化习俗的一种反映。研究辽东半岛青铜时代石棚的学者经常引用《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中关于石棚的描述,将此视为对石棚的最早记载:“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并以为其形如帝王戴之冠冕,称为“冠石”。这段记载虽是为公孙氏图谋霸业制造舆论,似也可以理解为公孙氏重视以石棚为标志的当地传统文化的一段记录。

史载,公孙氏从东汉末中平6年(公元190年)割据辽东,到魏景初2年(公元238年)被魏所灭,期间不过50年,但在这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中原战乱,辽东稳定。公孙氏善纳贤仕,令行于海外,于是汉代名儒等,或陆上,或渡海,由中原、山东趋辽东者,记有:前汉诸吕之乱,有琅琊王氏避乐浪;王莽之乱,有逢萌客于辽东;后汉避辽东者,有管宁、邴原、王烈、国渊、刘政、太史慈^[20]。可以推测,公孙氏短期内在辽东地区取得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效果,不仅是因为与中原当时的动荡相比,辽东较为安定,而且也在于来自中原的文化与当地文化得以很好结合,与当地民族的和谐共处,从而对四周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公孙氏之后辽阳壁画墓的强劲延续,更有理由理解为辽阳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由于有当地固有文化作为基础,所以并不因为公孙氏及其之后的朝代更替而中断,从而纳入其中的汉风在辽东地区的延续也较中原为长。说明当地社会的稳定性和文化的顽强性。

四是对周边地区主要是三燕和高句丽墓制影响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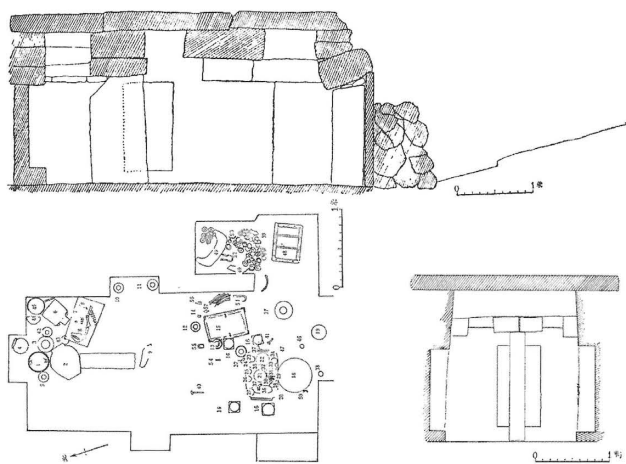
辽西以朝阳为中心的三燕地区墓葬所受辽阳壁画墓影响,田立坤曾有论述。他以为,袁台子壁画墓的“石板搭盖石室墓”结构和平面布局,与辽西土著的“石块垒砌石椁墓”有所不同,而更近于辽阳壁画墓,可能就是受到辽阳壁画墓影响甚至是随着辽东大族向辽西的迁移,将自身葬俗也随带过来的结果。其年代也应在四世纪初,即前燕时期^[21] (图七)。

对高句丽墓制的影响则要复杂得多。目前对高句丽墓制变化观点并不一致,大致为:由反映本民族葬俗的积石土圜墓到受中原影响而演化出封土石室墓是变化的关键;方坛阶梯石室墓出现时间在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封土石室壁画墓出现时间在4世纪中叶到5世纪初,典型墓例如角觝墓和舞踊墓^[22]。

关于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出现所受外部影响,50年代以来,曾多提到与辽阳壁画墓的关系。早在50年代初,宿白先生就对佟寿墓壁画结构与壁画所受外来影响作过如下分析:

“墓室四壁都是由整块岩石所凿成,其上涂白粉,绘壁画,这种作风是间接受到我

国山东、河南一带汉代画像石墓的影响，而直接承袭了我国东北辽阳一带三国时期的壁画石墓的作法”^[23]。60年代，俞伟超先生在为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龙凤里发现的“辽东城冢”调查报告所作的跋文提出：“‘辽东城冢’的形制，与辽阳发现的诸石室壁画墓近似。”“原报告说：‘（这座墓）平面布置不同于以前发现的高句丽墓，却和中国辽阳三道壕发现的石槨墓接近。’很显然，‘辽东城冢’是受了辽东地区



图七 袁台子壁画墓平、剖面图

葬俗的影响后的产物，或者可以进一步推测墓主与高句丽征服辽东城之役，有着密切的关系。”^[24]李殿福先生也认为：“古代高句丽的埋葬制度，由石坟向土坟过渡，除了本身的内在因素之外，也可以看出中原的先进文化对高句丽的影响。中原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石室或砖室的封土墓。在东北地方，自战国以来，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辽东郡首府的辽阳一带，发现大批的汉代封土石室墓，对高句丽墓葬形制及葬俗的演变，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25]魏存成先生也以为，从壁画内容和布置分析，集安壁画墓中最早的两座墓：角觝墓和舞蹈墓，有墓道绘伏犬、守卫，一斗三升的斗拱、夫妇对坐。一般以为也是受到辽阳壁画墓的影响^[26]。

不过，近年来，以为高句丽壁画墓的形成与乐浪郡有关的观点渐多。如王巍先生认为：“高句丽于公元313年灭乐浪，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兴起的年代恰好也在四世纪前半，二者当非巧合。我们认为，高句丽的封土石室墓很有可能是接受了乐浪汉墓的影响而出现的新的高句丽墓制。”徐秉琨先生也认为：“朝鲜境内壁画墓的选址都在汉魏乐浪郡、带方郡的辖区之内，为探讨包括壁画墓在内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和当地封土砖室墓的关系及其渊源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高句丽大中型封土石室墓的时代在约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公元313年高句丽占领乐浪和带方郡，进一步接受了汉魏墓葬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外覆封土、内建木槨、砌筑砖室和石室的墓葬制度和结构。”^[27]

两汉时代的辽东郡与乐浪郡，在文化发展上具有较多同步性，包括两汉时期流行于这两个地区的土圹木槨墓和砖室墓，但以辽阳壁画墓为主要内容的封土石室墓，则在辽阳地区开始之早，延续时间之长，是乐浪郡所不具备的，所以，对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及封土石室壁画墓所受影响，仍然应该考虑是以辽阳地区为主的。

文献也多记高句丽与公孙政权的交往。公元197年山上王继位，其兄发歧投公孙度并攻败；《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东伐高句丽”，《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公孙康“出兵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虽然高句丽封土石室壁画墓出现时公孙氏已亡，但辽东地区的封土石室墓制作为当地固有文化因素，仍在延续，高句丽与其西部的辽东和辽西地区接触也在不断加强，

高句丽封土石室墓的出现更多是受到辽东地区封土石室墓的影响，有其必然性。

这里还要提到有佟寿题铭的东岳3号墓(东晋永和13年，公元357年)^[28]，这座墓的墓顶已由单层演化为迭砌平顶墓顶；直接在石壁上作画；出现墓主人凭几执尾独坐方榻的内容代替夫妇对坐，从石室结构到壁画主要内容及壁画部位，都同于辽阳上王家两晋之际的壁画墓(图八)。佟寿墓和上王家墓墓主人的帐顶都饰莲花，佟寿墓又在西侧室和后室顶绘莲花。对此，宿白先生以为：东岳3号墓“藻井上面的彩绘莲座，以及莲花、舒叶等边饰花纹，却都是我国六朝以来佛教艺术的装饰课题。”^[29]由此可以推断，辽阳上王家墓帐顶莲花也当为佛教的装饰题材，应是佛教影响到辽东半岛较早的一个实例，而东岳3号墓中佛教装饰的来源，当直接来自于辽东郡。一般以公元372年“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三国史记》)为佛教传入高句丽之始。佟寿墓早于此10多年出现佛教影响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而辽阳上王家壁画墓与佟寿墓具有相同的莲花装饰，可能说明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辽东地区的作用。当然，这也是高句丽墓制变化受四周地区包括中原地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辽东地区或以辽东地区作为通道的实证。所以，随着辽阳壁画墓新的发现、资料的全面发表和研究，加强这方面的比较分析，应是今后的重点研究课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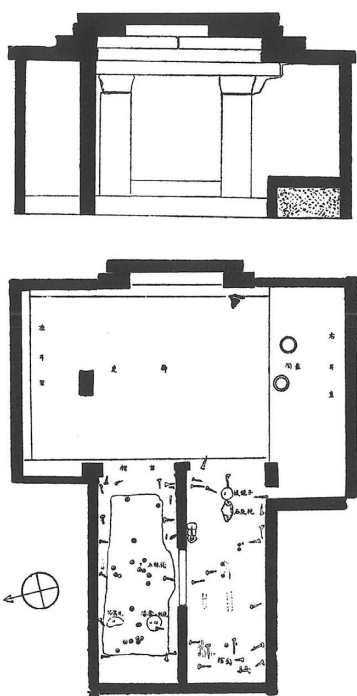
由辽阳壁画墓的以上三个特点，可以对公孙氏割据辽东的历史作用有些新的认识。

(一)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创造出具时代和地域特征的以石室壁画墓为主的地方特色文化，成为辽东地区社会文化繁荣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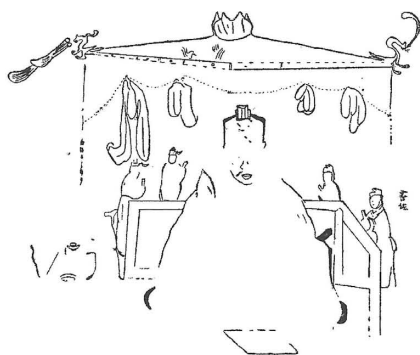
(二)将东汉收缩的东部又扩展回来，范围并超过西汉。

西汉武帝时，趁国力强盛，在继燕秦经营辽东的基础上，向东开设朝鲜四郡，昭帝时罢临屯真番，并为两郡，同时设乐浪东部都尉以治。据金毓黻先生综合各家考证，四郡中以真番、临屯较南，约与三辰相邻^[30]。

但到东汉时，朝内外戚宦官纷争，豪强门阀强势，由于国力所限和东部各民族的兴起，汉王朝的势力有向西收缩之势。西汉昭帝即罢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后玄菟郡又迁辽东境内。但在公孙氏统治辽东的短短50年时间内，其势力却向东大为扩展。史多载公孙政权“令行于海外”(《三国志·魏书·管宁传》)“威行海外”(《三国志·魏书·公孙度传》)。这尤以公孙康设带方郡为最。《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桓灵之末，韩秽强盛，郡县不能治，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宜，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秽，旧民稍出，是后倭秽遂属带方。”还有关于公孙氏与百济通婚的记载。带方郡地约在东浪郡南部或真番郡，并延于魏晋，成为与朝鲜半岛南部至日本列岛诸国交流的枢纽。此后魏与倭国的交往，都以带方郡为中介。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石城里城址发现有“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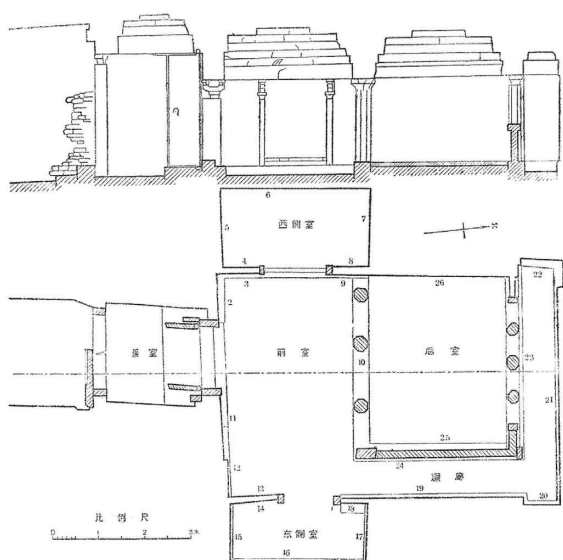
1 辽阳上王家壁画墓平、剖面图



2 辽阳上王家壁画墓右小室右壁墓主人宴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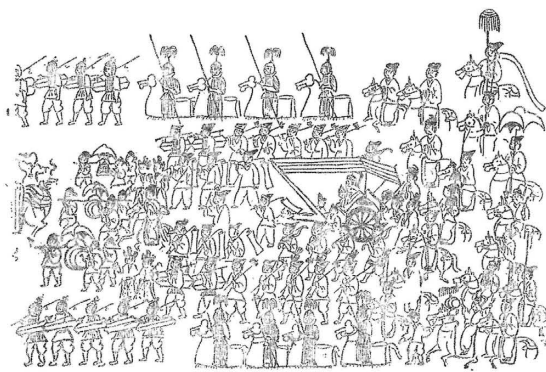
3 辽阳上王家壁画墓左小室车骑出行图



4 朝鲜东岳三号墓平、剖面图



5 朝鲜东岳三号墓右侧室右壁墓主人图



6 朝鲜东岳三号墓回廊左后壁出行图

图八 辽阳上王家壁画墓与朝鲜东岳三号墓石室结构与壁画比较图



图九 辽阳三道壕一号壁画墓“同出徐州”铭规矩镜

可见，公孙氏对东北及东北亚地区的经营，范围超过了西汉武帝时期。从而将汉文化传播影响到更广大的地域。据载，东汉后期，东北诸民族侵犯辽东诸郡不断，公孙氏统治辽东时期，则明显减少，局势似趋于稳定。魏灭公孙氏后，魏到西晋都承公孙氏旧规，续置平州，仍以辽东郡之襄平为平州首府，统制诸夷。晋初，还曾以辽东为“国”（《晋书·地理志》记“辽东国”，统县八）。时高句丽、鲜卑分别于辽东、辽西兴起，襄平地位更为持重。直到永嘉之乱后，晋人南迁，辽东复先为慕容仁据，后终被高句丽占领。反映的是朝代多次更迭，但社会发展承继性仍然很强，这与辽阳地区以封土石室墓所反映的时代连续性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还要再提到魏与倭国交往的重要史实。魏灭公孙氏后的次年（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遣使经带方郡与魏国交往，金毓黻以为，这是公孙氏开带方郡经略朝鲜半岛之效^[31]，辽东地区自然应该是必经地之一。时间为汉魏之际到西晋的三道壕一号壁画墓随葬有一面“同出徐州”（“铜出徐州”）铭规矩镜，为同时期前后中国南北各地诸多铜镜中唯一铸这一组铭文的，而同铭或近铭见于日本古坟时期汉式铜镜中达10余例，这当非偶然。应是辽东地区在当时中原王朝与海东的交往中所居重要地位的又一个实证^[32]（图九）。

（三）公孙氏之后，由它所创造和兴盛的辽东文化仍然延续，并波及四周，对公元2世纪到5世纪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古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正是东北地区包括鲜卑、高句丽等诸多民族文化先后兴起和活跃的时期，以辽阳壁画墓为文化发展主要标志的辽东地区是对周围诸民族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支文化。对它经营辽东，制控东北，进而影响东北亚地区，为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在中后期的发展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应给予充分估计。

注 释

- [1]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考察》第180~19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 [3] 李文信:《辽阳北园壁画古墓记略》,《李文信考古文集》第54~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 [4] a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1974年;b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 [5] 赵化成、高崇文等:《秦汉考古》第9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6] a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92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 [7] 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 [8] 《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 [9] 辽宁省博物馆冯永谦等:《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1985年第6期。
- [10] 同[8]。
- [11] 同[3]。
- [12] 同[2]。
- [13] 王增新:《辽阳三道壕发现的晋代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
- [14] 辽阳博物馆:《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4期。
- [15] 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7期。
- [16] a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b东潮、田中俊明:《高句丽历史遗迹》第260页,中央公论社,1995年;c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 [17] 同[4]a、[9]。
- [18] a刘未辽辽大学毕业论文;b同[8]、沈欣:《辽阳唐户屯一带的汉墓》,《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 [19] 俞伟超:《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坟之源》,《古史的考古学考察》第359~3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0] 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1944年。
- [21] 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文物》2002年第9期。
- [22] 魏存成:《高句丽遗迹》第203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3] 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 [24] 俞伟超:《高句丽时期的辽东城图》,《古史的考古学考察》第265~26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5] 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 [26] 同22第188页。
- [27] a王巍:《从考古发现看四世纪的东亚》,《考古学报》1996年第3期;b徐秉琨:《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第90~91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 [28] 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 [29] 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冬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 [30] 同[20]。

[31]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六卷，1944年。

[32]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椿井大冢山古坟と三角缘神兽镜》，1989年。

插图出处：

图一：《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16页插图二

图二：《李文信考古文集》第56页图一

图三：《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第19页插图九及图版六

图四：《文物》1985年第6期第25页图二、第26页图三、图四

图五：左，《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45页插图七、右，《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第19页图二十四

图六：《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第12页图十三，第13页图十五

图七：《文物》1984年第6期第29页图二，第30页图三、图四

图八：1～3，《文物》1959年第7期第60页图1、3，第61页图8，第62页图9、4～6，《考古》1959年第1期第28页图一；第30页图六，第32页图十一

图九：《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第53页插图五

『遼陽壁画墓群』研究ノート

郭大順

一

遼陽の壁画墓群は、国务院が1961年に第一段階として公布し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167号に指定)であり、その後も続々と新しい発見がなされている。1960年代から華北地方や東北地方で漢・晋代の壁画墓が相次いで発見され、関連の研究成果が発表されるにつれて、遼陽壁画墓の重要性がますます際立ってきた。しかし、正式な考古学的調査報告は、これまで発表されていない。また、その資料は分散しており、特に壁画に関して発表された資料が不完全で研究に目立った進展が見られず、遼陽壁画墓を研究する学界の取組みもいつの間にか弱まってきた。このような状態は、2世紀から5世紀頃の当地における古代文化の発展、及び東北地方に存在した他の古代文化との関係といった重要な学術的課題の研究を直接的に阻害している。また、ある側面から見れば、それが関係する他の研究課題の進捗をも遅らせていると言えるだろう。遼陽壁画墓に関する整理された体系的な発掘報告を可能な限り早く発表し、その研究を強化することは、既に焦眉の急となっている。

2004年2月14日から遼陽で行われた壁画墓の保護及び検証に参加したとき、筆者は、幾つかの資料を調査してノートにまとめた。そして、遼陽壁画墓の学術的価値について、完全な内容ではないが何点かの考え方を提起している。この重要な考古学的資料を整理して体系的に発表するうえで、それが少しでも役立つことを願うものである。

二

現在、全国で発見された漢・魏時代の壁画墓は約100カ所を数えるが、それらの造営の最盛期は前漢から後漢の中・後期である。その約5分の1に当たる20基を占めるのが遼陽の壁画墓である。また、遼陽の壁画墓及びそれに関連した石室墓の大多数は、現在の遼陽城の北郊外(北園、棒台子、三道壕、上王家、迎水寺、南林子、および玉皇廟)と東南郊(鵝房、唐戸屯、桑園子、鞍山東沙河、南雪梅、及び市街区の東門里)に分布している。従って、遼陽は、今もお漢・魏代の壁画墓が最も集中している地域と言える。こうして、漢・魏代における壁画墓の構造や壁画内容の変遷過程、ひいてはそれらに反映された社会や歴史といった問題を理解するうえで得難い条件が一つの地域で提供されている。これは、同じ時代に造られた壁画墓の多くが単独で出現している他の地域には望めない点である。

遼陽の壁画墓及びその関連の墓は、漢・魏・晋といった時代の遼東地区で、現地の人々が中原からの移民とともに営んでいた政治、経済、文化、社会生活などの発展状況を多角的に反映している。特に、公孫氏が割拠していた後漢の末期における遼東の社会的・文化的発展や周辺地域との関係が窺えるた

め、漢末・魏・晋の時代に公孫氏が統治していた遼東の歴史的役割の位置づけをより深く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うした資料の収集や研究に際して、筆者は以下の3点に強い印象を抱いた。

その第一は格式の高さである。

以前の埋葬方法は土坑・木棺槨式であったが、前漢及び両漢の時代には、人の階級や身分を表すため、死者の生前の住居を模した磚室の構造としたり、その日常生活を壁画に描いたり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龔偉超氏の研究によると、前漢の末頃に始まって後漢にかけて盛んに造られた何代もの人の合葬墓は、周代の宗法制度に代わって大土地所有制に基づく家族制が強まってきたことを反映している。また、それに合わせて礼器から模型の明器に代えられた副葬品は、莊園経済の発達を表したものである。また、車馬での出行、仕官の経歴、墓の主による饗宴、様々な芸能(音楽、舞い、劇など)、莊園の邸宅、侍従や属吏、厨房での仕事、農作業といった現実生活を表した壁画の内容及びその配置や変化の規則性などにも、主として莊園経済の発展が反映されている¹。

遼陽地区の石室壁画墓には複数の人が模型の明器とともに合葬され、その壁画には墓の主の現実生活などが描かれている。地域によって特徴は異なるが、やはり漢代の方式を守っており、その時代の階級制度も表現されている。

一般的に、車馬出行図のある北園1号墓や棒台子1・2号墓、三道壕車騎墓が、格式の高い墓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そのうち棒台子1号墓は、封土が截頭方錐形をしており、残存高7m、各底辺の長さ22mである。槨室の中央へ4組の石板を縦に並べて三つの棺室に分け、外周が回廊になっており、左右の後ろへ一つずつ小室が突き出している。左右の幅約8m、前後の奥行き約6.6m、高さ約1.4mである。墓門には4本の石柱が立っていて、三つの石扉が設けられている。壁画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左右の両小室では主人飲食図が見られる。右の小室の絵は、主人と衝立の後ろに侍立した2人、及びその前に跪いて食べ物を捧げる3人といった計6人を描いたものである。左の小室の絵には、主人及び食べ物を捧げる5人、その後ろで侍立した3人など計9人が描かれている。主人の正面に当たる墓門内側の左右両壁は雑技図になっており、右壁の3層には計23人、左壁の3層には約25人が描かれている。出行図は右回廊の左右後ろに当たる壁3面と左回廊の左壁に見られ、右回廊の後壁が1層になっている以外は、いずれも2層である。そこには、173人の人物、127頭の馬、及び黄鉞車、鼓車、金鉞車といった王室が出行の際に用いるものを含む10輦の車が描かれている。後部回廊の後ろ左壁は邸宅図で、その中央には3層の高い楼閣がある。屠殺、調理、清掃などに従事する計22人が描かれた庖厨図は、後ろ小室の右、後ろ、左に当たる壁3面で見られる。これらの他、墓門に2人の門卒と2頭の番犬を描いた門卒図がある。蓋石、壁の端、棺上には雲気図がある。この墓は遼陽壁画墓の中で最も規模が大きく、他のどれよりも壁画の内容が豊富で、その年代は後漢時代の末頃とされている²(図一)。

北園1号墓は、封土の残存高が約10mである。石室は長さ7.85m、幅6.85m、高さ1.70mで、前、横、後ろにそれぞれ小室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その中央は4枚の石壁により3室に分けられ、周囲を回廊が巡っている。建物のように梁、柱、斗拱、扉などを造り、排水施設が設けられている。壁画は次のとおりである。後ろの小室の後側と左側にある壁は宴飲図で、西の隅から東を向いている主人の東側に2人が縦に並んで対座し、4人の小吏も畏まっている。後ろ右壁の右側と左側では、それぞれ属吏図、楼閣図、楽舞図(上)、雑技図(下)などが見られ、右の小室には闘鶏図、前の左角には倉廩図、室内の右壁には車列図、室内の左壁には騎従図といった壁画がそれぞれある。この墓の規模、構造及び壁画内容を考えると、その格式は棒台子1号墓³(図二)に次ぐものと思われる。

上述した2基の墓は年代が漢から魏であるため、墓の主は公孫氏と推測されることが多い。

これら大規模な壁画墓2基を中心とする遼陽壁画墓群の等級や格式について、大いに研究を要する点は、そのいずれもが回廊を設けた構造で造ら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回廊を設けた墓は、諸侯王といった最高位の者を葬る墓として前漢から造られ始めた。北園1号墓と棒台子1号墓は、遼陽壁画墓の中において最大規模の墓ではある。しかし、中原地方などにある漢代の墓と比べると、回廊を設けた諸侯王の墓より小さいだけでなく、漢代に造られた複数室をもつ壁画墓の多くと比べても大きくない。例えば、河北や内蒙古で後漢後期に造られた多室または三室の壁画墓は、すべて全長が20m以上あり、望都2号墓の全長は32mにも達する。また、安平で後漢の熹平5年(西暦176年)に造られた、大きな車馬出行図や建築鳥瞰図のある多室磚室壁画墓は、その長さが40mを超えている。しかし、宿白氏は1970年代の初め頃から次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た。すなわち、遼陽壁画墓のうち内部で棺室の周囲を回廊が巡っているような大墓は、前、中央、後ろの3室をもつ後漢時代の大規模な壁画墓より格式が高く、黄腸石*や回廊が設けられた河北省定県北庄にある後漢前期の中山簡王劉焉墓(光武帝劉秀の末子、1960年代から70年代前半に発掘された唯一の漢代諸侯王墓)と同等で、その等級は漢の諸侯王の墓に相当する⁴。これに関しては、次の点にも言及すべきである。つまり、後漢の後期には地方官吏や豪族の勢力が拡大するとともに諸侯が没落し、諸侯王の墓にも回廊が設けられなくなった。そして、諸侯王から二千石の官吏、延いては一千石の官吏までもが、すべて河北省の望都1号・2号壁画墓のような多室か三室の墓を用い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⁵。したがって、年代が後漢末あるいはそれ以降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依然として回廊が設けられている遼陽の壁画大墓こそ、こうした漢代における諸侯王の墓の構造を示す最後の実例と言える。

遼陽壁画墓の等級の高さは、墓の壁画にも表れている。遼陽壁画墓にある壁画の寸法は、墓の規模と同様、いずれも中原地方などの大規模な壁画墓に及ばない。しかし、遼陽の壁画では、より格式の高い題材を用いている。例えば、天井が金鳳で飾られた北園1号墓や龍の流蘇(ふさ)が用いられた上王家の墓は、諸侯王の墓と同じ等級で、その技法も引けを取らない。中でも棒台子1号墓の壁画「車馬出行図」には、黄鉞車、鼓車、金鉞車などが描かれている。『後漢書・輿服志』では「乘輿大駕(皇帝の車)」と「甘泉鹵簿(甘泉宮への行幸)」に関連して「その後ろに金鉞車、黄鉞車、黄門鼓車などが続くこと」と定められているため、李文信氏は、この壁画が帝王の行幸と同じ格式で描かれている、と考えた。同氏は「墓の壁画『車騎儀仗図』には金鉞車、黄鉞車、黄門鼓車が1輦ずつ描かれている。これは、漢代に封建統治を行っていた皇帝及び高級官吏や将軍たちが出行する際、その儀仗隊にだけ許された車である」と記述している。また、『新中国の考古学による収獲』にも「棒台子屯壁画墓の回廊壁画では、墓の主が車に乗って出行するときの盛大な行列を描いている。その行列には、彩幢や華蓋を持ち長旗を掲げた騎従者以外に、帝王の行幸に従う黄鉞車、鼓車、金鉞車といった儀仗隊も見られる。これは、豪族が割拠していた状況を充分に表している」(図三)との記述がある⁶。

漢代の帝王の陵墓が発掘された事例はなく、華北地方などで発見された同じ年代の壁画墓にも、このような帝王と同じ格式の題材を描いた壁画は見られない。そのため、棒台子1号墓の壁画は、今のところ漢代の帝王が行幸する様子を描いた唯一の壁画であり、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と言える。

遼陽壁画墓の構造や壁画内容に表現された格式の高さは、遼東に割拠し天下を志していた公孫氏に関する史書の記載と一致している。

『三国志・魏書・公孫度伝』の記載によると、後漢の末頃、董卓の幕僚から遼東の太守に推薦された

公孫度は、「漢の命運は絶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いまこそ、諸君らとともに王の位を狙うべきだ」と大きな野望を抱いた。そして、「海を渡って東萊郡の諸県を支配下に収め、営州刺史を置いた。自立して遼東侯・平州牧と名のつた」とあるように、遼東郡、遼西郡、中遼郡を領有した。次第に勢力を広げるにつれ、「漢の二祖(高祖・光武帝)の靈廟を建立し、独断で決定する権利を得て、天を祭る壇と地を祭る壇を襄平の南郊に設けて天と地を祀り、籍田の儀式、閱兵式を行い、鸞車に乗り、九旒を用い、旌頭をなびかせた羽林騎に護衛させる」といった数々の僭越な行いを始めた。

また、『晋書・地理志』には「後漢末、公孫度は自ら平州牧と号し、及びその子・康と康の子・文懿は遼東を併せて擅据し、東夷九種が皆焉(これ)に服事す。魏は東夷校尉を置いて襄平に居らしめ、而も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楽浪の五郡に分けて平州と為す」という記述がある。これと読むと、三国時代には、なお公孫康が平州に任じられ、帶方郡を分置して、遼東、昌黎、玄菟、楽浪、帶方など五郡を領有するうえ、東夷校尉も兼ね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ら六郡を統治していたため、その地位は太守に止まらず、州刺史をも超えていた。康の子・公孫淵の時代に至って、さらに燕王となっている。

以上の文献と考古学的成果とを併せて比較すると、次のことが重ねて証明される。すなわち、こうした中原地方における諸侯王の墓に相当する最も高い格式をもつ墓は、確かに公孫氏と関係がある。また、公孫氏が遼東に割拠して行った行為は極めて僭越であったことも伺われる。

第二は、地域的な特徴が持続的に変遷していく過程である。

壁画墓を含めて、遼陽一帯にある漢・魏代の墓について判明している年代は、前漢末期から後漢、魏、西晋を経て東晋の初期へと至る約300年にもわたっており、その時代を概ね繋げて把握できる。そうした時代の経過に伴う変遷を墓の形式という側面から見ると、大きく次のように分かれる。前期には土坑・木棺槨式の墓、中期には夫婦合葬の磚室墓、後期には家族を合葬する石造り(石室)の墓がそれぞれ中心となっている⁷。このうち土坑・木棺槨式の墓が磚室墓になっていった形式上の変遷は、中原地方と一致している点が認められるが、若干のずれもある。それらと類型が異なる石室墓は、非常に多くのものが出土するので地域的な特徴が最もよく分かるうえ、壁画墓もすべて石室構造になっている。そのため、墓の類型、特に石室墓は、遼陽壁画墓の地域的な特徴及びその変遷過程を研究するうえで最も重要な内容の一つと言える。

遼陽壁画墓の編年や構造の変遷については、既に多くの学者の研究成果がある。また、壁画墓と他の石室墓を比較しながら年代を区分することで、遼陽の石室墓及び壁画墓の起源まで遡る試みもなされている。ここでは、それらをさらに整理して補うこととする。

まず、そうした石室墓が造られた年代の上限について述べる。1950年代の前半に唐戸屯と鵝房の墓地を発掘したとき、既に当時の発掘調査者が、これら2カ所の墓からは、年代が比較的古い資料が出土していると報告している。その『簡報』において、それらの石室墓を造営した年代が相当に古い、という判断に関する部分は重要なので、少し長くなるが引用して説明する。

唐戸屯は遼陽市から東へ20kmほど行った太子河の北岸にあり、1954年の5月から6月にかけて192基の墓を調査した。「墓を築いた材料は97～98%が石板で、磚墓や木棺墓は極めて少ない」とするように、その多くが石室墓であった。これら石室墓の構造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に記述されている。「主に石板で墓の壁を築いて前に墓門を設け、上蓋や床面としても平らな石板を敷き、その継目に石灰を詰めている。単室墓の平面は多くが長方形で、形が複雑なものには「丁」字形、「工」字形、「十」字形といった数種類がある。槨室の規模については、その多くが大きいものではない。平均的な長さは2～3m、幅

は1.5～2 mで、3～4 m以上のものは極めて少ない。多くが南北方向またはやや東西方向に偏った南北方向を向き、槨室内に屍床として石板を敷き、その上に遺体を安置している。屍床の内部では高い明器の台を設け、そこに様々な土製の明器が置かれている。墓門の前には斜めに地面まで達する墓道がある。現在、槨室の上方は大部分が農地になっており、既に封土は明確に識別できない。槨室内に埋葬されていた人骨は、男女で2体のものが最も多く、1人だけ葬られていた例はあまり見られず、10人余りも葬られていた例外的な墓もあった。通常、遺体は屍床の上に置かれているが、幾つかの墓でだけは木棺に納められていた」。

副葬されていた遺物については、次のように記述されている。「土製の明器が中心で、その多くは生活用具の模型である。最もよく見られるものとしては、鍋、竈、釜、甑、井戸、水入れ、瓶、甕、案、俎板、杯、盤、奩、盒類、・・・銀や銅の指輪、ガラスの耳飾り、瑪瑙の玉、腕輪、骨製の玉などが挙げられる。金属器には鉄鏃、環頭大刀、銅帶鉤、銅指貫、小型銅印2個が含まれる。その銅印の一方は陰文の篆書体で「韓□筆者私印」と彫られた印(146号墓)で、もう一方は陽文で「公孫□□」と彫られた印(37号墓)である。このほか、ほとんどの墓で貨幣も発見されているが、最も多いのは漢の五銖銭で、王莽の「貨泉」、「大泉五十」、「貨布」などは少なく、「小泉直一」も1枚だけ見られた」。

こうした事実を受けて、この報告では以下のように分析している。

「これらの墓から出土した文物を総合すると、墓の年代は概ね前漢の末頃から後漢の時代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以後、このような墓の造営方法が次第に普及し、ついには遼陽の付近で広く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は、遼陽の石槨墓を研究するうえで参考になる重要な資料である。」

遼陽市東南郊にある鵝房は、おそらくさらに古い時代についての手がかりになる。ここでは漢代の墓19基が調査された。そこには、比較的古い時代の土墓や木槨墓、及び比較的新しい時代の石墓や磚墓があった。発掘担当者が明らかにしたところでは前漢の初め頃及びそれ以前の墓が見つかり、次のように記述されている。「前漢時代の土墓や後漢時代の石墓の下1 m余りに位置する地層から、より古い年代の墓が発見された。その埋葬方法、墓室の構造、明器の器種や形式はいずれも、「五銖銭」や「貨泉」などが多く出土する墓での状況と明らかに違っている。この発見により、遼陽・鞍山地区における漢代及びそれ以前の墓の年代を鑑定するうえで層位という科学的根拠が得られた」。この記述は、主として土墓、木槨墓、磚墓、石墓などの時代的な前後関係を示す層位上の証拠に関するものだが、遼陽地区における漢・魏代の墓と「漢代以前」に造られた墓との区別にも関係してくる内容である。それは、こうした「石墓」が思ったより古いことを示す情報なのかも知れない⁸。

壁画墓だけに限って言えば、比較的年代が古いのは東門里の墓である。この墓は遼陽市街東部にあって明代に築かれた東南城壁の下に位置する。石室の門は南側で、その後ろに横型の明器室があり、前廊や副室などはない。その平面は「丁」字形を呈し、簡単な構造をしている。家屋、井戸、竈、鼎、鐘、奩、案、灯、博山炉などの土器が副葬されており、その種類や形式は後漢時代の墓でよく見られるものである。壁画は出行図と宴居図のみで、対座した墓主夫妻、官邸の建築、様々な芸能、厨房といった題材は見られないが、羊や飛廉(風神)のような神獣は描かれている。簡単な構造の墓室、後漢時代末期のものが含まれない器種、飛廉はあっても対座した夫妻、様々な芸能、厨房などが描かれていない壁画という特徴を分析し、発掘者は、その年代を後漢時代の中期後半と判定した⁹(図四)。

遼陽で漢・魏時代の石室墓が存続した期間や年代の下限を考えるには、文字及び文字による年代の記

録が発見された墓を参考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遼陽で漢・魏・晋時代に造られた墓のうち、文字及び文字による年代の記録が発見されたのは以下の墓である。

三道壕27号墓は、後漢・和帝の永元17年(西暦105年)と記された土製の案が副葬され、後漢中期の年代である¹⁰。

北園1号墓は、墓室内部の右側にある小さな壁で「季春之月□(漢)」という題字が発見された。発掘の責任者である李文信氏は、この不鮮明な文字を「漢」と判断し、次のように記述している。「月の次に書かれた字は、左側が三水偏、右上が草冠で、「□」の形も明らかなため「漢」という字である。これは三月を表し、解釈は難しいが、「漢」という字で正しければ、その年代は明らかであり、非常に貴重なものと言える。」そのため、この墓の年代は一般的に後漢の末期と推定されている¹¹。

三道壕令支令墓。前廊、左右の副室、二つの棺室、左の通路などを備えた平面構造になっている。右小室の右壁と後壁には対座した男女が描かれていて、男性である主人の後ろに「□(魏)令支令張□□」という文字が見られる。その年代は曹魏時代とされている¹²。

三道壕7号墓石室の木棺から、副葬品として太康2年(西暦281年)の瓦当、及び「宜子長生」という銘文のある銅鏡が出土した。その年代は西晋時代である¹³。

三道壕西晋墓は工字形をしており、前後通路の左右にそれぞれ副室をもち、四つの棺室がある。男女が3人ずつ葬られていて、晋の太康7～10年(西暦286～289年)という年代を表す文字が石壁に刻まれている。また、「襄平」という文字が見られ、「位至三公鏡」も出土した¹⁴(図五)。

上王家石室墓は、発見された遼陽壁画墓の中で最も新しい形式の例とされている。東西の奥行きは5m、南北の幅が4m、最も高い頂部は2.5mである。前廊、二つの棺室、左右の小室などによって構成され、既に後室は残っておらず、門は東に向いて開く。特に、前廊の頂部が1層ではなく、4列の石板を平行に持送り、方形の平頂天井を形成している。また、男性の右腕の横で青磁虎子が発見された。壁画にも新しい題材が見られる。右小室の正面にある壁画では、冠を被って髭を蓄えた墓の主が榻座に座し、その右手で塵尾を持っている。左の小室には車騎出行図があり、黄牛の引く黒い車輪の牛車が1輦描かれている。この墓の年代は、西晋から東晋にかけての時代または東晋時代と推定される¹⁵。

以上のような資料に基づいて遼陽壁画墓の年代を区分したところ、いずれも大きな差はなかった¹⁶。宿白氏の見方を尊重した場合、遼陽の壁画墓は、漢・魏時代、魏・西晋時代、東晋時代の三つの年代に分かれる。また、墓の構造の時代経過に伴う変化を概括すると、複雑なものから簡単なものへ、豪勢なものから質素なものへ、という規則性が認められる。さらに、東門里の墓が発見されてからは、簡単なものから複雑なものを経て再び簡単なものへ、という変化の規則性も提起されている¹⁷。

以上のように、遼陽一帯では比較的古い時代から石室墓が造られ始めている。また、存続期間も長く、前漢の末頃も含め、後漢、魏、西晋などを経て東晋に至る時代、即ち紀元1世紀から4世紀初め頃まで造られ続けた。漢・魏時代に遼陽で盛んに造られた墓の中でも、石室墓は、土坑木棺木槨墓や磚室墓などと異なり、漢・魏時代以前に当地で造られていた墓がもつ構造上の主要な特徴を備えている。それが存続している間、公孫氏の政権が滅亡したため、規模は小さくなり、構造も簡単なものへと変わっていったが、前漢から両晋時代まで造られ続けたのである。ここで、壁画墓の石室構造も含めて、漢・魏時代に遼陽で造られた石室墓の起源、という問題が必然的に提起されてくる。それを解く一つの可能性として、漢・魏時代の各地で共通または類似する時代的な特徴が挙げられる。例えば、両漢時代に各地で盛んに造られた画像石墓と遼陽の壁画墓は、ともに精緻な加工を経た石板で築かれ、その壁画の題材も

似ている。中でも山東で漢代に発達した画像石墓と遼陽の壁画墓には、おそらく文化的な関係があ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もう一つの可能性として、遼東地区に特有な文化的伝統との関係も考えられるであろう。ここでは、後者の関係に重点を置いて説明する。

まず、当地における石室墓が非常に古い淵源をもっている、という点である。遼東地区は、青銅器時代から石室墓が発達していたことで知られており、それが3000年前における際立った地域的特色とされている。その構造は土坑石室墓、大石蓋墓、石棚式石室墓といった様々な形式に分かれるものの、やはり石板で築くのが基本的な形式と言える。戦国時代以降には、燕・秦・漢時代の郡県制が東北地方の南部で実施されるなど、燕の文化が東北地方へ浸透するにつれて、中原地方の特徴を備えた土坑墓が盛んに造られ始め、漢代には磚室墓も数多く造営された。しかし、石室墓は、それらによってすべて取って変わられて姿を消した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以後も根強く造られ続けていた。近年の遼東地区では石蓋・石棚式の石室墓が前漢時代まで存続していた実例が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れは次の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すなわち、当地(遼東地区)における民族的な埋葬習俗の特徴を反映した石室墓が、漢から魏の時代に遼陽地区で造られた壁画墓を含む石室墓と、時の流れとともにその距離を縮め関係を強めていっ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次は、漢・魏時代の前期に遼陽で造られた石室墓の形式に関する分析である。遼陽壁画墓の中で最も年代が古い劉末将玉皇廟3号墓は、長方形の石室と土製の円形竈が副葬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特徴としている。墓の年代は後漢の前期から中頃とされており、こうした長方形の石棺は現地の伝統に関係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しかし、唐戸屯にある石室墓の構造は、さらに問題の答えを明らかにしてくれる。例えば、既に発表されている唐戸屯62号墓の石室構造では、頂部の蓋石、底板、仕切板といったすべてが不規則な多くの石板を嵌め合せて造られており、側板にも大きな石を用いている。この点は、精緻に加工された石板を嵌め合せて造る漢代の画像石墓と大きく異なり、青銅器時代に遼東地区で盛んに造られた石棺墓の構造により近い¹⁸(図六)。

第三には、前述した通り、漢・魏時代の石室墓が遼東地区で極めて長期間にわたり存続したことである。前漢、後漢、魏、西晋などから東晋に至る過程を見ると、各地の画像石墓は後漢の末頃から廃れ始め、次第に石刻仏像が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ったが、石室墓は、なお遼東で盛んに造られていた。特に触れておきたいのは、魏・晋時代以来、中原地方で現れた新しい墓の方式が急速に周辺地域へ伝播していき、その影響を受けなかったのは遼東地区のみであったのであるが、このことには、当地の特有な伝統が直接的に関係している¹⁹ことである。

したがって、遼陽壁画墓が当地の伝統に根ざしていることは確かである。

後漢末期以降の公孫氏の時代に石室墓がより盛んに造られて長く存続した理由が、青銅器時代の当地における石室墓の伝統や習俗と関係しているとしたら、それは、公孫氏が遼東を統治する過程で当地の文化・習俗を重んじたことの反映であろう。青銅器時代に遼東半島で造られた石棚を研究している学者は、『三国志・魏書・公孫度伝』での記述を石棚に関する最も古い文献と見なし、よく引用する。そこには「当時、襄平県の延里の社に大きな石が出現した。その長さは1丈余りあり、下に三つの小石があって、大石の足の役目をしていた」とあり、その石は、形が帝王の冠に似ていることから「冠石」と呼ばれた。この記載は、公孫氏が覇業を企んで世論を喚起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が、公孫氏が石棚に象徴される当地の伝統文化を重視していた、と解釈することもできるだろう。

史書によると、後漢末の中平6年(西暦190年)から遼東に割拠していた公孫氏は景初2年(西暦238年)

に魏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その統治期間は50年にも満たない。しかし、その短い半世紀の間、中原では戦乱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たが、遼東は平穏であった。公孫氏は、多くの賢人を受入れ、それらの者を外国へ行かせたりしている。そして、漢代の名儒などが、中原から陸路を通り、あるいは山東から海を渡って遼東へ逃れて来た。記録によると、前漢時代の諸呂の乱に際しては琅琊の王氏が楽浪へ逃れ、王莽の乱に際しては逢萌が遼東に迎えられている。また、後漢時代に遼東へ逃れた者としては、管寧、邴原、王烈、国淵、劉政、太史慈などが挙げられる²⁰。そこで、次のような推測が成り立つ。つまり、公孫氏が短期間で社会の安定と経済の繁栄を実現したため、争乱に明け暮れていた当時の中原に比べて遼東地区が安定を保てただけでなく、中原から来た文化が当地の文化に上手く取入れられ、当地の民族と調和しつつ共存できた。それによって、遼東地区は周辺地域のものを引き付ける力を持ち得たのである。遼陽の壁画墓が公孫氏滅亡以後も根強く造られ続けたのは、遼陽地区における社会や文化の発展によるものと解釈して差し支えないだろう。それが遼東地区に特有な文化に根ざしていたため、公孫氏滅亡以後に起こった支配者の交代によっても中断することなく、新たに取入れた漢の特徴を中原地方よりも長く存続させてい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は、遼東地区における社会の安定性と文化の根強さを物語っている。

第四に取り上げるのは、三燕や高句麗をはじめとした周辺地域の墓制に対する影響についての、いくつかの注目すべき問題である。

朝陽を中心とする遼西地区、つまり三燕が支配した地域の墓に対する遼陽壁画墓の影響については、かつて田立坤氏が次のように論述している。袁台子壁画墓の「石板石蓋石室墓」という構造や平面配置は、遼西地区に特有の「石塊を積み重ねた石槨墓」と異なり、遼陽の壁画墓により近い。こうした遼陽の壁画墓による影響は、遼東から地位の高い者が遼西へ移り住んだ時、自分たちの埋葬習俗も携えて来た結果だと思われる。その年代は、4世紀の初め頃、つまり前燕時代であろう²¹ (図七)。

高句麗の墓に対する影響は、さらに複雑である。今のところ、高句麗の墓制の変化について見方は定まっていないが、概ね次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る。その変化で最も重要な点は、高句麗民族の埋葬習俗を反映した石積みの土坑墓が中原地方の影響により封土石室墓になっていったことである。方壇階梯石室墓は3世紀末から4世紀初め頃にかけて造られ始め、封土を伴う石室壁画墓は4世紀中葉から5世紀初め頃にかけて造られ始めている。それを示す典型的な例として、角抵塚と舞踊塚がある²²。

高句麗の封土石室墓に対する他地域の影響については、1950年代以来、遼陽壁画墓との関係が数多く提起されてきた。1950年代初頭には宿白氏が、冬寿の墓にある壁画の構造及び他地域からの影響に関して次の通り分析している。

「墓室の壁4面すべてが1枚の岩を削ったもので、その上に白粉を塗り壁画を描いている。このような造り方は、わが国の山東・河南一帯にある漢代の画像石墓から間接的な影響を受けており、東北地方の遼陽一帯で三国時代に壁画石墓を造った方法を直接的に踏襲したものである」²³。1960年代には俞偉超氏が、朝鮮の平安南道順川郡龍鳳里で発見された「遼東城塚」を調査した報告のあとがきにおいて、次の通り提起している。「遼東城塚」の形式は、遼陽で発見された多くの石室壁画墓に似ており、「原報告によれば「(この墓の)平面配置は、これまで発見された高句麗墓と異なり、中国・遼陽の三道壕で発見された石槨墓に近い」とされているため、「遼東城塚」が遼東地区の埋葬習俗から影響を受けた産物で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で、墓主が高句麗による遼東城の征服と密接に関係している、とも推測できる」²⁴。また、李殿福氏は次のような考えをもっている。「古代高句麗の埋葬制度は、積石墳から封土墳へと移行している。それ自体に内在している要素以外に、中原地方の先進的な文化が高句麗に与えた

影響も見て取れる。中原地方では、既に漢代から石室または磚室を伴う封土墓が造られていた。東北地方においては、戦国時代から政治、経済、文化の中心として遼東郡首府が置かれた遼陽一帯で、漢代の封土・石室墓が数多く発見された。これらの墓は、高句麗における墓の形式や埋葬習俗の変化を促進する一定の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²⁵。さらに、魏存成氏の考え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すなわち、壁画の内容や配置を分析すると、集安の壁画墓で最も年代が古い角抵塚と舞踊塚の羨道には、伏犬、門衛、一斗三升式の斗拱、対座した夫婦などが描かれているが、普通に考えれば、これも遼陽壁画墓の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であろう²⁶。

しかし、近年になって増えてきたのは、高句麗における壁画墓の形成が楽浪郡と関係している、という見方である。例えば、王魏氏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高句麗は313年に楽浪を滅ぼしたが、高句麗ではちょうど4世紀前半に封土・石室墓が盛んに造られており、それらの時期は一致している。高句麗の封土石室墓は、楽浪漢墓から影響を受けて創り出された新しい形式の墓だと考えられる」。また、徐秉琨氏の考えは次の通りである。「朝鮮国内の壁画墓は、すべて漢・魏時代の楽浪郡や帯方郡の域内で造られている。これは、壁画墓を含む高句麗の封土石室墓と当地にある封土磚室式石墓との関係及びその淵源を探るうえで有利な条件と言える。高句麗で造られた大・中規模の封土・石室墓の年代は、概ね4世紀中葉から7世紀初頭である。西暦313年に楽浪郡と帯方郡を占領した高句麗は、さらに漢や魏の埋葬文化から影響を受けた。その影響は、外部の封土、内部に造る木槨、磚室、石室などを伴う埋葬制度や墓の構造にも及んでいる」²⁷。

漢代の遼東郡と楽浪郡は、多くの点で同時期に文化が発展している。例えばこの時代には、この2つの地域で土坑木槨墓や磚室墓が盛んに造られている。ただし、遼陽の壁画墓が中心となる封土石室墓は、遼陽地区において古くから造られ始め長期間にわたり存続したが、その点は楽浪郡に当てはまらない。したがって、高句麗の封土石室墓や封土石室壁画墓が受けた影響は、やはり主として遼陽地区からのもの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

高句麗と公孫氏の政権で交流があったことは、多くの文献に記録されている。西暦197年に山上王が位を継ぎ、その兄である発岐が争いに敗れて公孫度のもとへ逃れたことを受け、『三国志・魏書・公孫度伝』には「東の高句麗を伐つ」と記されており、『三国志・魏書・高句麗伝』では公孫康が「出兵して高句麗を攻撃し、その都を破って、町や村を焼いた」と記録している。高句麗で封土石室壁画墓が造られ始めたとき、既に公孫氏は滅んでいたが、封土石室墓は遼東地区に特有な文化要素として造られ続けており、高句麗とその西の遼東・遼西地区の繋がりも強まっていった。高句麗の封土石室墓の出現は、遼東地区の封土石室墓から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たもので、必然的であった。

ここで、冬寿の墓誌がある安岳3号墳(東晋の永和13年、西暦357年)にも触れておく必要がある²⁸。この墓の天井部は、すでに単層から多層の持送り式へと変わっており、壁画は石壁上に直接に描かれている。塵尾を持った墓主が机にもたれながら方形の榻座に1人で座る構図が出現し、対座した夫婦から変化している。石室の構造から壁画の主な内容や描かれた位置まで、すべて遼陽の上王家にある西・東晋時代の壁画墓(図八)と同じである。冬寿の墓と上王家墓では主人の頭上に掛けられた帷に蓮華文をあしらっており、冬寿の墓では西室と後室の天井にも蓮華が描いてある。この安岳3号墳について、宿白氏は「藻井(持送り式天井)に描かれた蓮座、蓮華、舒葉といった文様は、すべてわが国で六朝時代から仏教芸術の装飾題材とされた」²⁹と述べている。これに基づいて推論すると、遼陽の上王家墓の帷に見られる蓮華は仏教の装飾題材であるため、遼東半島に仏教の影響がいち早く及んでいた実例の一つ

であり、安岳3号墳の仏教装飾は遼東郡から直接的にもたら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一般的には、西暦372年に「秦王の符堅が、使節と僧の順道を(高句麗に)遣わして、佛像や経文を伝えた」と記した『三国史記』が、高句麗への仏教伝来を示す最も古い文献とされている。この記録より10数年古い冬寿の墓に仏教の影響が認められたとしても、理解できる範囲ではある。そして、遼陽上王家の壁画墓と冬寿墓で同じような蓮華の装飾が見られることは、仏教東伝の過程で遼東地区が果たした役割を示している。当然、これも高句麗の墓制が変化する過程で受けた中原地方を含む周辺地域からの影響であり、それが主に遼東地区からもたらされたか、あるいは遼東地区が経路となっていた証左と言えよう。従って、遼陽壁画墓に関する様々な新発見や新資料の発表及び研究に合わせて、この点に関する比較・分析を強化し、今後の重点的な研究課題と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る。

三

上述の遼陽壁画墓の三つの特徴により、遼東に割拠した公孫氏の歴史的な役割を再認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一) 公孫氏は、中原文化と現地文化を融合させ、石室壁画墓を中心に時代的・地域的特徴を備えた独自の文化を創り上げ、遼東地区の文化的繁栄を表す象徴となった。

(二) 公孫氏は、後漢時代に失っていた東部を取り戻し、前漢時代の領土を超えて勢力を拡大した。

前漢時代の武帝は、燕・秦から引き継いで統治していた遼東を基礎に、強い国力を背景としつつ、さらに東へ進んで朝鮮四郡を置いた。昭帝の時代には、臨屯と真番を廃止して他の2郡に併合すると同時に、楽浪東部に都尉を置いて治めさせた。金毓黻氏の総合的な考証によると、4郡のうち真番と臨屯は比較的南の方にあり、三辰とは隣接していた³⁰。

しかし、後漢の時代になると、王朝内部での外戚や宦官たちの争いに乗じて、豪族の門閥が勢力を強めてきた。こうして国力が弱まってきたため、東部の諸民族が立ち上がり始め、漢王朝の勢力は西へ追いやられた。前漢の昭帝により真番と臨屯の2郡が楽浪郡及び玄菟郡に併合されていたが、玄菟郡は再び遼東の域内に属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ただし、公孫氏は、遼東を統治したわずか50年の間に、その勢力を西ではなく東へ大きく広げたのである。公孫氏の政権については、史書に「海外へ行かせる」(『三国志・魏書・管寧伝』)、「海外へ威行する」(『三国志・魏書・公孫度伝』)といった記載が数多く見られる。また、次の記載は、公孫康が帯方郡を設けたことを如実に示している。すなわち、『三国志・魏書・東夷韓伝』の「桓帝から靈帝の末年にかけての頃(西暦147-189年)になると、韓穢の力が盛んとなって、(楽浪)郡やその配下の県の力ではそれを制することができず、民衆は多く韓国に流入した。建安年間(西暦196-220年)、公孫康は屯有県以南の辺鄙な土地を分割して帯方郡を作り、公孫模や張敞らを遣ってこれまで取り残されていたその地の中国の移住民たちを結集し、兵をおこして韓穢を伐たせた。その結果、韓国に流入していた移住民も少しずつ戻っ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以後、倭と穢は帯方郡の支配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た。」という一節である。また、公孫氏と百済が通婚していた記載も見られる。楽浪郡の南部か真番郡の辺りに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帯方郡は、魏・晋時代まで存続し、朝鮮半島南部と日本列島諸国が交流するうえでの重要な基地となっていた。当時、魏と倭国の往来は、すべて帯方郡を中継して行われている。朝鮮の黄海北道鳳山郡にある石城里城址では、「使君帯方太守張撫夷」という銘が入った磚も発見された。

これから、中国東北地方及び東北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公孫氏の統治地域は、前漢の武帝が支配した範囲を超え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そのため、非常に広い地域へと漢の文化が伝播されたのである。記録によると、後漢の後期には東北地方の諸民族が絶えず遼東諸郡へ侵入していたが、公孫氏が遼東を統治した時代には、外部からの侵入が大幅に少なくなり、安定した情勢へと向かっていった。公孫氏を滅ぼした魏や西晋も従来の秩序を受け継ぎ、引続き平州を置いて遼東郡の襄平を平州首府とし、諸民族の統制に努めた。そのうえ、晋時代の初め頃には、遼東が「国」として格上げされている(『晋書・地理志』では、「遼東国」、八つの県を統べるとされている)。その頃、遼東では高句麗、遼西では鮮卑がそれぞれ力を強めていたため、ますます襄平の役割が重要となっていた。しかし、永嘉の乱によって晋の人々が南へ去り、遼東は、慕容仁による占領を経て高句麗の領土となった。こうして度重なる支配者の交代があったにも拘わらず、社会発展の継続性は、依然として根強く保たれていたのである。この見方は、遼陽地区の封土・石室墓に反映された年代の連続性とも完全に符合している。

ここで、魏と倭国の往来という重要な史実についても述べておく必要がある。魏が公孫氏を滅ぼした翌年(景初3年、西暦239年)、邪馬台国女王の卑弥呼は、帯方郡に使者を遣わして魏との交流をもった。金鏡載氏の考えによると、これは公孫氏が帯方郡を置いて朝鮮半島を治めたために派生したことであり³¹、おのずから遼東地区が経由地であったはずである。年代が漢・魏時代から西晋時代にあたる三道壕1号壁画墓には、「同出余州(銅出徐州)」という銘の入った1面の規矩鏡が副葬されていた。この銘文が見られるのは、中国各地で数多く発見された同時代の銅鏡の中で一つしかないが、日本古墳時代の漢式銅鏡には、似た銘文のものが10数例も含まれている。これは決して偶然ではなく、中原地方の王朝と東方諸国が往来するうえで遼東地区が果たしていた重要な役割を示す証左の一つなのである³²(図九)。

(三) 公孫氏が滅んだ後にも、その統治時代に生まれて栄えた遼東文化は、なおも受け継がれて周辺地域へも波及し、2世紀から5世紀の中国東北地方、及び東北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古代文化の発展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る。この時代は、まさに中国東北地方で鮮卑や高句麗といった諸民族の文化が相次いで起こり、活躍した時代である。また、遼陽壁画墓に象徴される遼東地区の文化は、周辺諸民族にも極めて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文化と言えよう。更に公孫氏は、遼東を治めて中国東北地方に覇を唱えたのみならず、東北アジア地域にも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が多民族国家を統一して中・後期に隆盛していく歴史の上で特別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十分に評価すべきであろう。

註

- 1 俞偉超：「考古学中的漢文化問題」『古史的考古学考察』pp.180-190、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 李文信：「遼陽発現の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資料』1955年第5期。
- 3 李文信：「遼陽北園壁画古墓記略」『李文信考古文集』pp.54-94。
- 4 a北京大学歴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1974年。b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県北庄漢墓発掘報告」『考古学報』1964年第2期。
- 5 趙化成、高崇文等《秦漢考古》p.96、文物出版社、2002年。
- 6 李文信：「遼陽発現の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資料』1955年第5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国的考古収獲』p.92、文物出版社、1961年。
- 7 孫守道：「論遼南漢魏晋墓葬制之發展演變」『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第1期。
- 8 「東北文物工作隊一九五四年工作簡報」『文物参考資料』1955年第3期。

- 9 遼寧省博物館馮永謙等：「遼陽旧城東門里後漢壁画墓發掘報告」『文物』1985年第6期。
- 10 同8。
- 11 同3。
- 12 同2。
- 13 王增新：「遼陽三道壕發現的晋代墓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1期。
- 14 遼陽博物館：「遼陽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簡報」『考古』1990年第4期。
- 15 李慶發：「遼陽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7期。
- 16 a張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第1期。b東潮、田中俊明：『高句麗歷史遺迹』p.260、中央公論社、1995年。c鄭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 17 同4a、9。
- 18 a劉未遼寧大學畢業論文。b同8。沈欣：「遼陽唐戸屯一帶的漢墓」『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 19 俞偉超：「中国魏晋墓制并非日本古墳之源」『古史の考古学考察』pp.359-369、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0 金毓黻：『東北通史』上編六卷、1944年を参照。
- 21 田立坤：「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認」『文物』2002年第9期。
- 22 魏存成：『高句麗遺迹』p.203、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3 宿白：「朝鮮安岳所發現的冬寿墓」『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
- 24 俞偉超：「高句麗時期的遼東城図」『古史の考古学考察』pp.265-267、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5 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第2期。
- 26 同22 p.188。
- 27 a王巍：「从考古發現看四世紀的東亞」『考古學報』1996年第3期。b徐秉琨：『鮮卑三国古墳－中国朝鮮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pp.90-91、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
- 28 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發現和研究」『考古』1959年第1期。
- 29 宿白：「朝鮮安岳所發現的冬寿墓」『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
- 30 同20。
- 31 金毓黻：『東北通史』上編六卷、1944年。
- 32 東北博物館：「遼陽三道壕兩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椿井大塚山古墳と三角縁神獸鏡』1989年。

* 前漢には柏の木で横に並べて囲んだ「黄腸題凑」という格の高い様式があり、後漢には黄腸石を用いた。1 m四方、厚さ0.25mの石で、多くに墨書が書かれる。

【挿図出典】

- 図1：棒台子一号墓平面図『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p.16挿図二
- 図2：北園一号墓平、断面及び壁画分布図『李文信考古文集』p.56図一
- 図3：棒台子一号墓金鉦車、黄門鼓車、黄鉦車模写図『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p.19挿図九及図版六
- 図4：東門里壁画墓平、断面図『文物』1985年第6期 p.25図二、p.26図三、図四
- 図5：左、三道壕第7号墓出土「太康二年八月造」銘瓦当拓本及び図『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1期 p.45挿図七、
右、三道壕第27号墓出土「永元十七年」銘陶案拓本図『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 p.19図二十四
- 図6：唐戸屯第62号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3期12頁図十三、p.13図十五
- 図7：袁台子壁画墓平、断面図『文物』1984年第6期29頁図二、p.30図三、図四
- 図8：遼陽上王家壁画墓と朝鮮安岳3号墳の石室構造・壁画比較図 1～3（上王家壁画墓）、『文物』1959年第7期
p.60図1、3、p.61図8、p.62図9、4～6（安岳3号墳）、『考古』1959年第1期 p.28図一、p.30図六、p.32
図十一。
- 図9：遼陽三道壕1号壁画墓「同出徐州」銘規矩鏡『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 p.53挿図五